

重塑連結的（不）可能：論韓麗珠《縫身》和 《離心帶》的越界想像

黃逸朗 *

摘 要

摘要：本文借助邊界的分析框架，聚焦個人／社會的邊界，透過對讀韓麗珠的《縫身》(2010)與《離心帶》(2013)，探討後九七香港語境中個人／社會關係的變形與再協商。本文提出，《縫身》呈現先破後立的敘事走向，透過徹底拆毀邊界的顛覆性實踐，反而使邊界的意義得以重新被看見，帶出個人空間不應湮沒於社會規訓中的訊息。《離心帶》則在守護個人空間的前提下更進一步，勾勒出一條「離軌」的路徑，嘗試突破社會規訓所劃定的邊界，並將「半空」塑造成一個懸置空間，藉以重新想像個人／社會關係的安置方式。綜觀兩部作品可見，韓麗珠並不將連結理解為無差別的「貼合」，也不把越界想像簡化為對現實的單純逃離；相反，連結與越界所指向的，乃是在受限處境中重新調整關係尺度的嘗試。透過梳理兩部作品對邊界的拆解、轉向與重設，本文進一步指出，韓麗珠藉由文學形式持續思考後九七香港關係結構的斷裂、重組與未竟之處，並以此回應重塑香港連結的（不）可能。

關鍵詞：韓麗珠、邊界、越界想像、後九七香港文學

*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博士生
(收稿日期：114.12.31；通過刊登日期：115.04.23)

一、緒論：邊界與越界

香港作家韓麗珠（1978-）自十四歲開始在報刊發表作品，九七回歸後出版第一本小說集《輸水管森林》（1998）。這一出版時間點也使她的寫作自一開始便與九七前後香港的歷史語境緊密相連。韓麗珠此後作品中反覆出現的空間異化、城市匱缺、失重感與邊界受壓等意象，皆可視為對主權轉移後香港感受結構的持續回應。她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潮後辭去了記者和編輯的全職工作，轉而專注寫作，並自2009年起陸續出版《灰花》（2009）、《縫身》（2010）、《離心帶》（2013）和《裸山》（2025）等多部長篇小說。就創作風格而言，韓麗珠的小說普遍帶有超現實主義色彩，擅於捕捉和描繪蒼涼與異化的景象，常把目光投向不常受到重視的城市內部空間中。個人和社會的關係，是她創作生涯中持續思考的核心命題之一。¹她的書寫往往不以正面再現事件為主要目的，而是把壓力與變動放回日常生活的層面，讓讀者從生活的紋理與身體的感受出發，辨認一種看似平靜、卻其實正在悄然改變的時局氛圍。

這種日常與變動的張力，也可放回後九七的城市經驗中理解。²回歸之後，香港的制度、經濟與城市想像被要求加速對接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節奏。在「發展」與「效率」的制度語言之下，許多轉變未必以劇烈事件的形式降臨，卻更常以細碎、綿長的方式滲入生活：空間被重新規劃，關係被重新調度，價值被重新排序。對不少人而言，困難之處不在於「發生了什麼」，而在於明明「什麼都沒有發生」，³生活卻一點一滴變得不再熟悉。正是在這種狀態裏，個人／社會之間的邊界最容易在

* 本文根據筆者的哲學碩士學位論文〈「迷霧時期」香港文學的「邊界」探索（1997-2014）：論陳冠中、黃碧雲、韓麗珠小說中的文化身分〉（2022）中部分章節改寫而成，在此非常感謝指導老師黃淑嫻教授的悉心引導。本文曾口頭發表於2023年7月14-15日韓國外國語大學世界文化創意研究所主辦的「第十三屆國際青年學者人文與文化學術會議」，感謝會議評論人高嘉勵教授的點評和建言。因應是次專輯主題，筆者增補改寫後修成定稿。感謝《興大人文學報》編委會的協助和兩位匿名審稿人的指教和指正。

¹ 董啟章形容韓麗珠的風格帶有卡夫卡（Franz Kafka, 1884-1924）的影子，對她深度探索個人／社會關係的努力和成果予以肯定。參見董啟章，〈「自然懼怕真空」——寫作的虛無和充實〉，韓麗珠：《風箏家族》（台北：聯合文學，2008年），頁5-18。

² 鑑於香港社會在雨傘運動（2014）後出現重大變化，為了更精確地把文本放回時代語境中理解，本文對「後九七」語境的討論，將集中在1997-2014年的範圍。

³ 此處借用了陳冠中小說《什麼都沒有發生》（1999）的小說標題，勾勒後九七（至雨傘運動前）語境中介乎平穩與變動之間的城市脈搏。

不知不覺間被推移：私人空間的尺度縮小，能夠說「不」的餘地變窄，而規範與要求則更容易以「理所當然」的方式進入身體、情感、判斷與生活。

在這種語境下，本文論述的邊界，並不只是清晰的分隔線。它同時是空間的距離，也是關係的尺度，是人如何把自己與外界區分開來、又如何與外界互相牽動的方式。邊界既可能用來阻隔，也可能用來保護；既可能被權力用來分類與規訓，也可能在壓力之下被重新劃定，成為仍可呼吸、仍可思考的縫隙。在邊界的理解上，本文借用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 1949-）對文化邊界的討論。巴巴提醒我們，邊界不必然只是阻隔或終結，它也可以是一種居間性的閹限（liminal）空間，使原先被分隔的事物得以互相牽動，在沒有預設框架之下生成揉雜的可能。而揉雜指向的，往往不是可預判的既定結果，而是一種走向超越的開放狀態，使不同聲音在其中碰撞，並由此帶出新的意涵。⁴循此思路，本文關心的不是邊界作為固定分隔的作用，而是邊界如何在作品中被感知、被撼動、被迫「貼合」，甚至被重新劃定；換言之，本文援引巴巴，主要並非為了抽象地討論文化混雜，而是藉此理解個人／社會之間的邊界如何從既定的分隔線，轉化為一種在壓力下不斷被重組、協商的關係空間。

若從韓麗珠創作發展的脈絡觀之，《縫身》與《離心帶》之所以值得並讀，正在於二者集中呈現了她對個人／社會關係的思考，如何由早期的防衛姿態逐步轉向更複雜的邊界想像。韓麗珠早期小說中的人物，往往透過退回衣櫥、木櫥、牆壁等隱身空間，在個人與社會之間築起一道帶有防衛意味的邊界；及至首部長篇小說《灰花》，這道邊界已不再只是封閉自守的屏障，而開始顯露出流動性，指向個人與社會重新互動的可能。到了《縫身》與《離心帶》，韓麗珠則進一步追問：當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被迫「貼合」，或被「導回正軌」的要求所規訓時，原本用以區分二者的邊界將如何受到衝擊，而個人又如何在受限處境中安置自身，並調整與社會之間的距離。選擇這兩部作品作為討論對象，不僅有助於說明韓麗珠如何延展對個人／社會關係的思考，亦更能具體呈現後九七香港語境中，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邊界如何在規訓壓力之下被重新感知、撼動與協商。

近年有關後九七香港文學的研究，已從不同角度揭示主權移交後香港小說的感受結構與主體處境。有論者從「非常態」與「不完整個體」切入，指出後九七小說常

⁴ 參見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1-18.

藉由異化、殘缺或失衡的身體，折射主體性受損與社會規訓加劇的處境；⁵也有研究從「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世代脈絡出發，強調韓麗珠等作家如何在城市快速重組與生活感受持續變動之中，書寫屬於後九七香港的經驗。⁶就與本文討論較為接近的研究而言，則有論者從後九七城市書寫與「我城」想像的角度，理解韓麗珠作品中的「消失」命題；⁷亦有研究以《縫身》為中心，從身體與空間書寫、規訓與反抗等面向切入。⁸這些討論為理解韓麗珠小說中的個人／社會關係提供了重要參照。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透過《縫身》與《離心帶》的對讀，從個人／社會邊界的拆解、重設與越界想像出發，追蹤韓麗珠對後九七香港關係結構的持續思考，並說明越界想像並非單純的逃離，而是對個人／社會關係尺度的重新調整與再協商。

在《縫身》和《離心帶》中，韓麗珠顯然有意在此前的基礎上作出突破。⁹兩部作品都以個人／社會之間的拉扯為起點，卻不滿足於只呈現壓迫或困局，而是藉由拆解、轉向與重設邊界的越界想像，深化對後九七處境的思考。《縫身》把「貼合」推至極端：在被要求全面縫合的世界裏，個人空間如何逐步式微，又如何仍試圖以裂縫保留一絲獨立性；《離心帶》則把「在軌」的要求推到身體層面：當不協調被命名為病，「離軌」的欲望如何被壓抑、被矯正，又如何在掙扎中轉化為通往半空的想像。若說前者在縫合的壓力下反覆呈現裂縫如何生成與被重置，後者便在「離軌」的推進中追問，離開地面秩序之後，是否仍可能另闢一種安置方式，使越界不只意味著撤離，也同時指向重新配置關係的可能。

由此可見，本文探討的越界，並非單純的逃離，也不是對現實的浪漫化否定。它更接近一種在受限處境中重新調整位置與關係的嘗試。當既有的連結形式逐步收

⁵ 參見黃冠翔，〈「不完美個體」的隱喻：香港後九七與「非常態」敘事〉，《文化研究季刊》第177期（2022年4月），頁1-22。

⁶ 參見鄧文律，〈「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中的城市與自然〉，《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28期（2020年9月），頁519-551。

⁷ 參見劉淑貞，〈「消失」作為一種方法：九七回歸後的「我城」書寫——以韓麗珠的寫作為討論對象〉，《東海中文學報》第43期（2022年6月），頁75-113。

⁸ 可參見符燕鴻，〈無法自控的身體——韓麗珠《縫身》初探〉，《名作欣賞》第14期（2015年5月），頁49-50；梁淑雯，〈無法「把身體放下」：香港女作家韓麗珠小說中的身體書寫〉，《文藝爭鳴》第2期（2018年2月），頁7-13。

⁹ 在創作初期，韓麗珠便展現出對城市中的個人空間的高度重視，在個人與社會之間築起了一道防衛性的邊界。如在《輸水管森林》（1998）和《寧靜的獸》（2004）的早期短篇小說中，每當人物在社會中遇到困難，顯得無所適從時，他們均可退回屬於個人的邊界內，藏匿在形形色色的隱身地點中。及至其首部長篇小說《灰花》（2009），當小說人物面對社會加諸的壓力時，他們不再滿足於消極的隱匿，開始尋求與社會對話和協商的可能。

緊，越界想像便成為重新思考「如何相處」的契機，在文學層面回應重塑香港連結的（不）可能。本文所說的「連結」，並不同於和諧共融或重新縫合的「理想」狀態，而是指個人與社會之間各種關係如何被安排、被要求、並在日常裏被感受的方式。它既包括親密關係與工作生活等層面的互相牽動，也涉及城市空間與公共秩序如何進入個體的情感與判斷，迫使人們調整自身的位置。因而，「重塑連結」在本文中更接近一種關係尺度的重新協商，在不斷收緊的規訓之下，仍試圖保留差異、距離與可呼吸的縫隙，使相處得以以另一種形式延續。下文的討論將先從《縫身》談起，觀察作品如何透過展現縫合與拆毀之間的張力，凸顯個人空間備受壓迫的困境，並在破壞之後重新提出邊界的必要；繼而轉向《離心帶》，分析「離軌」的路徑如何開展，半空又如何成為自創邊界的可能場域；最後總結兩部作品對邊界的拆解、轉向與重設，回應後九七香港文化身分的複雜面向，並進一步思考：在「什麼都沒有發生」的表象之下，文學如何捕捉連結的斷裂與再造，使出路的想像得以被保留、被拖長，並在未竟之處慢慢顯影。

二、縫合與裂縫：邊界的拆除和重設

《縫身》採用雙線並行的敘事結構：奇數章節為女主人公「我」的故事，偶數章節則由「我」的論文穿插而成。女主人公是即將畢業的大學生，生活在一個實行縫身政策的城市。按照城市法例，人們在達到法定年齡後必須接受縫身手術，與另一人的身體連接起來，成為連生人。「我」的故事以倒敘方式開展，開首交代縫身後的生活狀況，繼而回溯「我」從獨身人轉變為連生人的過程。與此同時，論文段落則像一面鏡子，以研究式的語言把故事中難以直說的壓力與矛盾折射得更清楚。兩條線索互為表裏，使縫身不只是情節設定，更成為一個需要被不斷辨認、反覆追問的命題。

「縫」在小說中具有雙重指向，既是縫合，也指裂縫。縫合固然構成作品最醒目的表層主題，縫身一詞本身便指向身體上的縫合與連接；然而，隨著故事推展，讀者便會慢慢發現，裂縫才更接近作者真正關注之處。縫身手術一旦完成，個人／社會的邊界便被制度性地拆除。連生人仍保有個人的意識與感受，卻已不再是完全獨立自主的個體。「我」不再只是「我」，被迫以「我們」的形式存在。「我們」介乎個人與社會之間，由兩個個人組建成一個「小社會」，使個人與社會的邊界變得

含混不清。小說正是在這種含混之中逐步揭示縫合背後的危機，並透過對各種裂縫的呈現，嘗試重設個人與社會之間仍不可或缺的邊界。

小說開篇首先勾勒縫身政策的「理想」藍圖。概言之，政策以「雙贏」作為主要說辭，強調個人與社會可以彼此成就，旨在打造一種和諧共融的個人—社會共同體。這樣的語言之所以奏效，正在於它把縫合包裝為一種自然、合理、甚至值得嚮往的生活方式，使「必須縫合」不以粗暴的命令出現，而以改良式的承諾滲入到民間日常之中。因此，縫身不只是對身體的處置，更像是一套重新安排關係與秩序的規範，透過看似溫和的方式把個人推向集體所期待的軌道。然而，通過記敘「我」在手術後的經歷，縫身政策的真正代價慢慢浮現。個人／社會邊界的拆除並未導向雙贏，反而讓兩者的關係徹底失衡，個人空間面臨完全消失在社會規訓之中的危機。縫身後，「我」不再是此前的「我」，而成為了「我們」的一部分。「我們」意味著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邊界消失，如論者所指出，個人不再是最小的社會單位。¹⁰成為連生人後，「我」雖仍能保持個人的思想，卻身陷一個以共同名義運作的小社會之中，並受制於另一個個人「樂」的制約。

小說在此並不急於把「樂」寫成單純的惡人，而是慢慢呈現這種溫柔的暴力。當「我們」被當作理想形式，社會規訓便能更順理成章地進入最隱密的私人領域。譬如手術後初期，當「我們」站在交通燈前，對目的地方向出現分歧時，「我」與「樂」均遵照《連生人生活指南》中「凡事忍耐，凡事謙讓，爭吵是禍端」¹¹的規條，不願說出真正的想法，爭相成為服從者。這一場景之所以關鍵，在於它揭示出，原本多被理解為公共領域的社會規訓，已悄無聲息地滲透至私人空間之內。正如論者所言，在縫身法例的掩護下，社會規訓的管轄權力大幅提升，擴展到城市中每一個微細角落。¹²「我」與「樂」在不知不覺間成為了規訓的共謀者，互相制約彼此的生活和行為，在壓縮對方個人空間的同時，自己亦失去了個人自由，最終發展成個人與個人的雙輪局面。由此，拆除邊界的後果變得具體，不再停留在理念之爭，而是關乎生活如何被重新安排，甚至連說出真心話的權力都在「和諧」的名義下逐漸萎縮。

¹⁰ 參見符燕鴻，〈無法自控的身體——韓麗珠《縫身》初探〉，《名作欣賞》第14期（2015年5月），頁49。

¹¹ 韓麗珠，《縫身》（台北：聯合文學，2010年），頁166。此後引用只註頁碼。

¹² 參見梁淑雯，〈無法「把身體放下」：香港女作家韓麗珠小說中的身體書寫〉，《文藝爭鳴》第2期（2018年2月），頁12。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之中亦存在性別問題。韓麗珠有意藉由對主人公女性身分的強調，更為深刻地揭示個人空間徹底失陷的危機。¹³在小說中，「我」和「樂」雖然各佔「我們」的一半，但關係並不平衡，主導者的角色由始至終都更靠近男性的「樂」。微妙之處在於，這種失衡未必以赤裸的命令或暴力呈現，而往往披上「為你好」、「為我們好」的溫柔外衣，使規訓得以在親密關係之中更順暢地運作，甚至讓退讓看起來像是愛的證明。例如在完成縫身後，身為治療師的「樂」一直勸導「我」放下論文寫作，全心投入助護工作。他在觀察到另一對連生人出現不協調的狀態後對「我」說道：「他們的矛盾，源於各自待在原來的崗位上，而不是處理相同的工作」（168），彷彿以理性分析提出藥方，實際上卻預設了「協調」必須以其中一方的讓步來完成，而這一方更自然地指向女性。所謂「處理相同的工作」，在這裏不只是工作安排的建議，更像是一種把差異磨平的倫理要求：為了避免衝突，為了維持「我們」的和諧，個人（女性）便應主動收起自己的追求。正是在這種話術之下，規訓不再只是源於公共領域的壓力，更以照料與關心的名義進入私人生活，使「我」難以直接說不，因為拒絕「協調」似乎同時意味著拒絕關係本身。

更甚的是，「我」甚至無法按照自己的喜好選擇聆聽的音樂。「樂」以一句「只是無病呻吟而已」（178）全盤否定了「我」所熱愛的地下樂隊，並為「我」開列出一份度身訂造的音樂清單。這種安排表面上像是體貼的「照顧」，實際上卻把感受與品味也納入矯正的範圍。當「我」被要求聆聽什麼、避免聆聽什麼時，「我」所失去的已不只是選擇權，而是那個能在日常縫隙中短暫退回自身、保持獨處的空間。周蕾曾指出，隨身聽時代開啟了一場「聆聽革命」，人們得以在隱密的個人空間中不受干預地享受音樂、自我陶醉乃至短暫「消失」於現實世界。¹⁴然而在小說世界裏，連這種看似微不足道的自由也變得遙不可及。親密關係被改寫成規訓的管道，愛被用作磨平差異的理由，最終讓個人（尤其是女性）的自主空間在「和諧」與「共處」的名義下被逐漸消耗殆盡。

¹³ 韓麗珠在一次訪談中透露，她在書寫《風箏家族》（2008）時開始深入思考女性身分的問題：「寫的時候，想的愈來愈多。以前不會思考女性身份的問題，只覺得人就是人。但這次寫的時候，卻想很多女性身份的事，多了一份自覺，人們對你有期望，你又會因應期望，作出不少選擇。隨著這種身份，又帶給別人另一些東西。因此小說中大部分角色都是家庭的女人。你不難發現，男人都是被敘述者。」李卓賢，〈韓麗珠放一隻風箏剖一個如果〉，《文匯報》，「讀書」版，2008年6月9日。

¹⁴ 參見 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62–163.

《縫身》揭示拆除個人／社會邊界所引發的危機後，並未止於絕望，而是透過裂縫的呈現嘗試重設邊界。在小說中，最關鍵的一道裂縫正是「我」的論文。它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它提供了反對的立場，而是在於它以另一種語言與節奏，讓「我」得以從「我們」的生活裏暫時抽身。換言之，論文的力量不在於宣告式的抗爭，而在於它把注意力、時間與思考重新放回到「我」身上，使「我」仍能在壓力之下保留一個可以命名、可以整理、也可以暫時不配合的角落。當縫身要求的是全面「貼合」，論文卻反過來維持一種必要的距離：它把「我」與「我們」拉開一點點空隙，使個人／社會的邊界不至於在日常協調與互相忍讓中被悄悄抹平。因此，論文不只是一種思想活動，更成為私人空間的具體形態，讓裂縫得以被持續擴寫，並在看似無法撼動的規訓秩序中，重新顯影邊界的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論文在《縫身》中不僅作為主人公保存私人空間的媒介，也構成了小說重要的反身性裝置。韓麗珠並未單純讓「我」在縫合秩序之中承受壓力，而是安排「我」一邊身處制度之內，一邊透過論文的形式分析、整理並命名縫身的歷史與心理結構。正因如此，論文不只是情節中的書寫物，也改變了小說的閱讀方式：它使《縫身》不僅敘述規訓如何在個體之中運作，也在形式上展示個體如何於規訓之內仍試圖保存一個可供思考與辨認自身的位置。若說裂縫在情節層面維繫了「我」與「我們」之間尚未被完全抹平的距離，那麼論文則在形式層面進一步使小說本身成為辨認、整理並回應規訓的一種方式。

在縫身手術之前，「我」撰寫了〈論文大綱一〉與〈論文大綱二〉，可視為對抗的第一階段。〈論文大綱〉在結構上形成參差對照的效果：一方面，它以研究者的語氣試圖把「縫身」納入可被分析的脈絡；另一方面，它也在不斷的整理與命名中，凸顯個人與社會之間不平衡的權力結構，讓讀者看見社會規訓如何隨時擁有把個人裁定為正常／異常的權力。¹⁵在研究過程中，「我」終究未能完全抵禦來自社會與親朋的壓力，仍與「樂」進行了縫身手術。然而，「我」始終堅持把論文完成，並在手術後繼續撰寫〈個案研究一〉與〈個案研究二〉，構成對抗的第二階段。此時，論文不單只是個人／社會之間的邊界，也成為了「我」與「樂」之間的重要邊界。它從全面「貼合」的要求中切出一道縫隙，讓「我」得以保留不被立刻協調、不被立即

¹⁵ 參見符燕鴻，〈論韓麗珠《縫身》的空間書寫〉，《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3期（2015年6月），頁85。

消化的部分。正如韓麗珠所言，論文是在主人公能力範圍內較有力的抵抗方式。¹⁶這也提示我們，裂縫不必等同於轟烈的行動，它往往以更持久、更柔韌的方式存在，在被要求放下、被要求配合之時，仍把某些事情留待自己去完成。

然而，論文的寫作並非一帆風順。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影響下，「我」多次陷入迷惘，處於搖擺狀態。「我」並非天性堅定，而是反覆經歷自我懷疑，甚至看到妥協如何逐步成為一條看似省力的路。小說的細緻之處，在於它不把抵抗浪漫化，而是把抵抗放在疲憊、孤立與質疑的現實之中，使堅持看起來更像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猶豫後砥礪前行的成果。支撐「我」重新站穩立場的重要因素，是「我」在研究過程中遇到的幾位同樣位處社會主流以外的人物。他們以各自方式守護個人／社會的邊界，為「我」帶來啟示與力量。其中，「我」的論文指導老師腿子教授在體制內努力創造可以容納個人空間的縫隙；親戚紫薇姑母則嘗試在體制外凝聚抗拒屈服的力量。兩人在城市中心與邊陲遙相呼應，共同發出以裂縫對抗縫合的異質聲音。透過這些人物，小說把抵抗寫成一種可被傳遞的經驗。當個體難以單獨承受壓力時，邊緣位置之間的互相照應，便可能成為裂縫得以延續的條件。在這些啟發下，「我」最終徹底堅定信念，決心不惜代價與「樂」分割。值得注意的是，小說把分割寫成一個與縫合對峙的詞彙，當縫合要求全面「貼合」，分割便爭取把個人空間重新拉回可呼吸的距離。分割在此不只是身體層面的分離，更是對規訓語言的一次拒絕，拒絕把個人的差異視為需要被修正的偏差，也拒絕讓「我們」成為一種遮蔽個人聲音的集體名義。

然而，小說並未把分割寫成一條不必付出代價的出路。相反，它更進一步揭示，在縫合秩序已深植於身體與日常的情況下，分割的完成往往必須與毀壞甚至死亡一同承擔。這一點其實早已在「我」論文中的〈個案研究〉埋下伏筆。在那些案例裏，分割固然意味著對自由與獨立的追求，卻同時伴隨極高風險，甚至以生命作為代價。正因如此，故事後段才將這一代價推至極端：「我」在愈來愈清楚意識到自己正被規訓同化之際，最終選擇以服毒的方式完成與「樂」的分割。

隨著縫身時間日久，即使「我」盡力維持對抗意志，卻仍開始出現被社會規訓同化的跡象。這種同化之所以可怕，在於它未必以劇烈痛楚的形式出現，卻以更隱蔽的方式改寫一個人的感受與判斷，使人逐步失去辨認自身處境的能力。小說便以

¹⁶ 參見韓麗珠，〈生命中不能缺失的寫作〉，《讀書好》第42期（2011年3月），頁10。

一個極其微妙、卻令人震動的瞬間，寫出「我」如何在不自覺間轉用規訓的語言。當「我」聆聽紫薇姑母的痛史時，竟忍不住問道：「你為什麼不安於本份，任由自我不受控制地分裂？」（200）這句話之所以令人震動，正在於它幾乎完全站在縫合秩序的立場發問。它把「安於本份」視為理所當然的要求，又把個人對分割與獨立的追求命名為「自我不受控制地分裂」。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在話一出口後便立刻察覺其中的「質詢」意味，並因此感到驚訝。這說明規訓並不只是從外部施加壓力，而是已經滲入「我」的語言與判斷之中，使「我」在尚未真正作出選擇之前，便已經先替秩序說了話。這一刻的可怕，不在於「我」已徹底改變立場，而在於「我」開始在無意識下以主流的尺度衡量他人，也同時衡量自己。如此這般，抵抗不再只是外在對抗，更變成了一場在自我之中拉扯的內耗。

在這樣的處境下，「我」雖在肉身上仍然活著，卻彷彿一步步走向靈魂的耗損，早已踏進死亡的邊界之內。正是在此，小說安排「我」以死亡作為最激烈的越界方式，留下無法被抹除的裂縫。需要謹慎指出的是，小說並非將死亡浪漫化為輕易的解答，而是把它放在一個壓迫性的結構之中，讓讀者看見，當所有可行的裂縫逐步被縫合，甚至連個人意念都開始替秩序效力時，死亡如何被寫成一種徹底拒絕同化的極限姿態。與其說它是消極的逃避，不如說它是對全面縫合秩序的終極否定，藉由最極端的方式重置個人／社會的邊界，傳達出作者在牢固規訓下仍要守護個人空間的堅定意志。

韓麗珠在一次訪談中指出，縫身的指涉是開放多元的，可以涵蓋任何社會強加於個人的規範。¹⁷若放回後九七的語境，這種強加規範可視為對社會在缺乏足夠諮詢下過於急速發展的批判。在成名作〈輸水管森林〉（1996）中，韓麗珠已流露出對城市急劇變遷的焦慮。九七回歸後，政府進一步加緊現代化改革的步伐，務求在全球化時代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但急速發展亦衍生樓價飆升、自然空間喪失、社區關係斷裂等城市內部問題。這些問題不只關乎資源分配，更關乎人如何在城市裏安置自己，以及如何在變動之中維持彼此之間可供依靠的關係。進入後九七時期，連同韓麗珠在內，有危機意識的香港人縱然親身體會到急速發展引致的各種問題，卻往往感到無力改變現狀。在缺乏具效率與透明度的諮詢制度下，個人的異議聲音難以有效進入社會發展藍圖與規訓的視域，久而久之在民間形成一種強烈的

¹⁷ 何翹楚，〈一點點縫起的小說——訪《縫身》作者韓麗珠〉，《明報》，「讀書」版，2011年1月16日。

無力感。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無力感並不只表現為對制度的失望或對現狀的無從介入，更會逐步沉澱為一種日常感受結構：人們明知有所失落，卻未必能有效說出拒絕，甚至往往在尚未意識到之前，便已學會以「配合整體」的語言要求自己與他人。

從這個角度理解，《縫身》所呈現的，正是後九七香港在表面追求協調與發展的語境下，個人空間與差異如何被一步步壓縮，並最終滲入身體、情感與判斷之中的文化心理。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中，《縫身》提醒讀者，所謂縫合未必能保證帶來更好的共同生活，反而可能以「為了整體」之名吞沒個人空間與差異；但即使城市中的個人空間在社會規訓的制約下持續收窄，我們仍不可主動放棄抵抗的權利，應在可行範圍內致力重設個人／社會的邊界，讓逐漸縫合的世界裏仍然保留各式各樣的裂縫，使人與人之間仍有重新調整、互相照應的可能。

總括而言，《縫身》把個人／社會邊界被拆除的危機推至極端，在全面「貼合」的世界中反覆探索裂縫如何生成、如何被守護，乃至如何以最激烈的方式留下痕跡。這些裂縫不必然帶來可預判的「勝利」，卻使邊界的必要性重新顯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縫身》所叩問的，並不只是裂縫如何留下，更是邊界何以仍然必要。從巴巴的觀點看，邊界本可被理解為一種具有轉化潛能的闕限空間，使原先被分隔的事物在碰撞中生成新的意義。然而，《縫身》所呈現的並不是這種具有開放性的臨界場域，而是邊界在制度命令下被強制拆除、個人與社會被迫無縫「貼合」的極端情境。正因如此，小說才更尖銳地道出：一旦個人與社會之間再無可供退避、喘息與協商的距離，所謂「和諧」便會迅速轉化為規訓的同義詞。換言之，《縫身》並非單純否定邊界，而是在邊界被徹底抹除之後，反過來凸顯其作為個人得以保存獨立性之必要條件。所謂共同體並非必然建立在無差別的「貼合」之上，真正可持續的相處，反而需要保留差異與喘息的空間，使人與人之間仍有著重新調整關係的可能。如是者，裂縫不只是拒絕或破壞，更像是在縫合的秩序裏努力保留下來的縫隙，讓個人仍能在壓力之中與他人互相照應，不致被完全吞沒。接下來轉入《離心帶》時，問題將不再只停留於邊界如何被拆毀和重設，而是進一步追問：在守護個人空間的基礎上，文學的越界想像能否另闢蹊徑，嘗試為「離軌」的個人在社會中另覓安身之所。

三、「離軌」的欲望：邊界的突破與自創

《離心帶》以一種無法預防、亦無法根治的病徵「飄蕩症」為軸心展開。患者一旦發作，身體會失去控制而向上飄升，若未被及時發現並拉回地面，便可能愈飄愈遠，終至消失無蹤。小說以患者「鳥」的故事為主線，她在與情人「白」同居期間病發，其後被轉介予「賣氣球的男人」照料，同時配合主管「尋找失去的人計畫」的「執法者」，追尋飄蕩後失蹤的母親「了」的下落。在治療與調查的過程中，「鳥」對飄蕩的理解逐步改變，並在故事尾聲抵達目的地——半空。如果說《縫身》把個人空間的消失推向極端，那麼《離心帶》處理的，則是另一種更難以安放的感受，不是單純被迫「貼合」，而是感到自己始終不在其位，彷彿無論怎樣調整，也無法順利嵌回社會所要求的軌道。這種「離軌」的欲望，一方面關乎個體對既定秩序的不適，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後九七日常生活中那種持續的淤塞與無力感。《離心帶》試圖追問，當個體已無法再以回復「正常」作為出路，越界想像能否開闢另一條路徑，把原本用來規訓人的邊界推開，甚至另行自創。

韓麗珠自言，創作《離心帶》之際，生命正處於一個淤塞的時期，逐漸意識到自己無法符合社會對「成功的大人」的各項標準，遂衍生出「脫軌」的欲望。¹⁸她其後又發現，這種欲望並非單屬個人，而是一種普遍存在於社會的現象。¹⁹這段創作自述之所以值得放入本文脈絡，不在於用作者意圖替文本定調，而在於它讓我們更容易理解《離心帶》如何把「不合規格」的感受具象化為身體狀態：飄蕩是一種無法消除的內在傾向，反映個人／社會之間長期處於不協調的張力之中。當城市的「正軌」被反覆宣稱為唯一可行的方向，「離軌」的欲望便不只是任性或逃避，而是一種在無力感中仍試圖尋找出口的衝動。因此，飄蕩在小說中並非單純的奇觀設定，而是把個人／社會關係中的壓迫與失衡轉化成可感知的身體經驗，人並非「想離開」才離開，而是在某些條件下被推向失重。飄升既像本能的釋放，也像壓抑過久後的副／反作用，使「離軌」成為一種既被動又主動的混合狀態。

¹⁸ 參見鄧小樺，〈過渡時期的辯證——韓麗珠談《離心帶》〉，《自由時報》，「藝文」版，2013年8月5日。

¹⁹ 參見孫梓評、韓麗珠，〈詩小說對話錄——孫梓評 vs. 韓麗珠〉，《印刻文學生活誌》第115期（2013年3月），頁29-30。

然而，飄蕩雖常以不由自主的方式發生，在社會主流視角中卻仍被定位為疾病，甚至被視為需要被處置的「一股反抗的力量」。²⁰飄蕩者因此被貼上「患者」的標籤，必須接受看管與治療。小說由此建立出兩個看似清晰的分類：「飄蕩症」患者與「健全者」。前者被視為「脫軌」，需要被醫治並導回「正軌」；後者則是「在軌」的，並擁有協助與引導患者的權力。²¹但《離心帶》的關鍵不在於把患者與健全者對立起來，而旨在指出，這道界線本身就是一種社會規訓的邊界。當飄蕩被定義為疾病，社會便取得一種把人裁定為正常／異常的權力，並以「照料」之名擴展管轄的範圍。於是，飄蕩不是被理解為一種可被聆聽的感受，而被重新編排成可被管理的問題。而所謂「正軌」，也不再只是一套「正常」的生活方式，而是背後有著權力支撐的制度語言。

儘管患者與「健全者」在角色設定上看似黑白分明，兩者之間的邊界卻並非涇渭分明。《離心帶》反覆讓「在軌」者產生動搖，甚至流露出與飄蕩者相通的內在傾向，使讀者看見，受困於規訓邊界的，不只是被驅逐到邊緣的患者，也包括那些站在秩序中心、負責看管與引導的人。以「賣氣球的男人」為例，他與社會福利部合作，因病患人數過多而不斷接收轉介個案，扮演看守者與照護者的角色。然而與患者「鳥」相遇後，他的立場逐漸鬆動。他開始承認自己其實無法為患者提供確切指引，甚至以「瞎子」的比喻指向自己與「鳥」的共通處境：兩人都在摸索，所謂「引導」在此不再堅固，反而暴露出制度階級的空洞和脆弱。在故事後段，「賣氣球的男人」照鏡時看見自己與「鳥」的重象，更把這種互相照見推到可視可感的層次：所謂「健全者」與患者的差異，或許只在於一方尚能把本能壓回體內，另一方則不由自主地把它釋放出來。

「執法者」的動搖同樣值得注意。他作為「尋找失去的人計畫」的主管，負責跟進因飄蕩而失蹤的個案，任務在於把失蹤者帶回地面秩序之中。然而小說並未讓他牢牢地站在「在軌」的位置上。相反，讀者常常透過「鳥」的觀察，看見他身體裏那種難以名狀的緊繃。例如在資料室與卷宗之間，他總下意識地把拳頭握緊放在口袋裏，像是在把某種衝動壓住不讓它浮上來；又例如他在聆聽「鳥」的母親「了」的筆記本內容時，表面上仍維持著公事公辦的姿態，但其沉默與停頓卻洩露出一種被牽

²⁰ 韓麗珠，《離心帶》（新北：INK 印刻文學，2013 年），頁 25。此後引用只註頁碼。

²¹ 參見鄒文律，〈論韓麗珠《離心帶》的疾病書寫〉，《文學論衡》第 26 期（2015 年 6 月），頁 72-81。

動的遲疑。這些細節把「健全」寫成一種需要長期維持的姿態。「執法者」之所以能被稱為「在軌」，正因為他必須不斷壓抑那股隨時可能把自己帶離地面的力量。在此，患者與「健全者」之間的差異不再是本質之分，更像是壓抑程度與社會標籤的差別。邊界在此不只劃分群體，也滲入身體，成為人人均需要面對的內在拉扯。

在這種困局下，小說讓人物作出大破大立的嘗試，不再尋求重返「正軌」，而是跳出整個社會軌道的框架，透過「離軌」的越界想像，嘗試突破社會規訓所制定的邊界。然而，「離軌」並非立刻抵達自由，它更像把限制從地面秩序挪到另一個位置。人物不再被必須「在軌」的要求擠壓，卻仍要面對另一套條件與代價。正因如此，「離軌」在《離心帶》中沒有被寫成輕盈的解放，而是一種更為複雜的轉向：它拒絕被矯正，卻也承認出路往往帶著負擔，以及不穩定性。亦言之，「離軌」並不是把邊界一筆抹去，而是把邊界轉移到另一種形態之中。從前，邊界以「飄蕩是一種病」的命名運作，把人推回「正軌」；在「離軌」之後，邊界則轉化為「如何安置自己」的問題。離開了地面的秩序，並不同於立刻擁有可供棲身的新天地；相反，人物反而要在失去既定的座標之後，重新摸索一種能暫時安置自身的方式。

這種邊界形態的轉向，亦在小說的敘事結構安排上進一步推展。《離心帶》同樣採用雙文本並置：文本一為全知敘事者的第三人稱敘事，文本二則為「了」在筆記本上的第一人稱書寫。筆記本的篇幅雖只佔全書一小部分，卻有著引路的功能。它不只是補完情節的附件，亦是一條隱伏的思路，一方面把飄蕩從「病」的社會語言中挪開，讓它不必立刻回到需要被矯正的框架；另一方面也在字裏行間為「離軌」提供了另一種理解的可能，使飄蕩得以被視作出路的方向，而不只是需要被處置的偏差。更重要的是，筆記本本身也像一道可以行走的邊界。它既是「了」的私人書寫，為她保留一個仍能自行命名、整理與追問的空間（與《縫身》中的論文書寫遙相呼應）；同時它又不是完全封閉的自言自語，而是可以被轉交、被朗讀、被聆聽的文字。正因如此，它既能把某些東西暫時從制度的分類與診斷中抽離出來，又能在特定的時刻穿透制度的流程，把飄蕩者的經驗帶到他人面前，甚至牽動那些原本站在「在軌」位置上的人。換言之，筆記本讓「離軌」不只是屬於個體身體的事情，也成為一種可以被理解、被感染、被傳遞的經驗形式，讓越界想像獲得延伸的可能。

若與《縫身》的論文相比，《離心帶》中的筆記本並不以分析制度為主要功能，而更接近對失重經驗的保存與承接。它未必能整理出一套清晰的知識結構，卻使原本難以安置、難以穩定命名的感受得以留下痕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記本在

《離心帶》中同樣具有反身性。它不僅是情節中的書寫媒介，也成為小說保存越界經驗、使其得以被辨認的重要形式。若說《縫身》的論文偏向於在規訓內部建立分析空間，《離心帶》的筆記本則更像是在失重之中保留尚未成形的出路想像。

筆記本的四個部分由閱讀筆記、瑪雅斯族見聞、夢境書寫與離家出走後的記錄構成。前兩部分的語調相對克制，像是以客觀的方式陳述資訊與觀察。但這種克制並非完全的中立，而是一種慢慢積累的位移，在不直言情緒的語氣中，飄蕩逐步被賦予另一種價值。進入第三、四部分後，筆記本的語調明顯轉變，從平穩漸趨激昂，到後段甚至直抒胸臆，流露出對飄蕩的強烈憧憬。筆記本中那句「沒有另一個人，另一種目光，無論失重或飄蕩，都是無傷大雅的事」（178），正是邊界轉向的關鍵。它把飄蕩與「目光」扣連在一起，意味著飄蕩不只是一種身體現象，更關乎在規訓視線之下如何生活。所謂「離軌」，首先不是往外逃，而是把自己從那套不斷評估、矯正與命名的目光中挪開，先把感受與判斷的主導權收回來，把邊界轉向到「如何安置自己」的問題。因此，「了」的抉擇並非單純是「不想再回正軌」，而是清楚意識到回「正軌」所要求的代價（長期壓抑自身傾向）已不可承受。她不再讓自己在日間「在軌」、夜間「脫軌」的反覆中拖延選擇，決心徹底向「離軌」傾斜：不再以回復「正常」作為目標，而以越界想像嘗試突破社會規訓所制定的邊界。

如果說筆記本呈現的是「了」如何一步步走向「離軌」的邊界，那麼它在情節中的另一重意義，是成為女兒「鳥」面對飄蕩的轉捩點。「鳥」起初對飄蕩的態度是恐懼與抗拒的。首次病發時，她發出低啞的呼救聲，並迅速學習以繩索、鐵網等方式把身體固定住，甚至讓情人「白」在夜間連人帶網壓在她身上，以防飄走。這些防守性的做法看似理性，卻把關係推向內耗：鐵網令彼此傷痕累累，也暗示「愛」在此被改寫成互相牽制的工具。防守因此並非純粹的保護，而是一種以傷害維持「在軌」的代價。²²其後，「鳥」從「執法者」手中得到「了」在失蹤前遺下的筆記本，並在配合調查的要求下朗讀其中內容。朗讀的過程使「鳥」逐步理解母親的思考與選擇，並產生了強烈的共鳴。²³饒有意味的是，這份共鳴並非只發生在母女之間，在「鳥」朗讀時，「執法者」也被迫聆聽到「了」的聲音，立場也隨之動搖。筆記本因此像一道穿透制度邊界的裂縫，它讓「疾病」的敘事不再只由權力機關講述，而能夠由飄蕩者自己敘述，並藉此感染他人。讀完整本筆記本後，「鳥」向「賣氣球的

²² 參見溫煒鈺，〈香港作家韓麗珠小說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頁73。

²³ 參見鍾夢婷，〈抵達·軌跡以外〉，《明報》，「讀書」版，2013年7月21日。

男人」提出請求：「把我也放進天空裡去吧。」（188）這句話標誌著她的決定性轉向，飄蕩不再只是必須壓制的病徵，而成為了她願意承擔的抉擇。換言之，「離軌」在此不再是被動形態，而是一種被重新奪回的權利，一種把自我從規訓秩序中抽離、重新安置的方式。

「離軌」後的目的地是甚麼？小說多番暗示飄蕩的終點為死亡，這使《離心帶》延續《縫身》中以生死辯證回應規訓的筆法：當「活著」被規訓為長期壓抑與自我耗損，死亡便可能被重新理解為拒絕同化的決斷姿態。然而《離心帶》最關鍵的轉折，是「鳥」並未把目的地設定為徹底消失，而是停留在半空。半空成為一個特殊的閹限位置，介乎地面秩序與天空終點（死亡）之間，使出路不必等同於終結，而指向另一種仍可延伸的方向。半空提供了一個仍未被既定秩序完全佔領的間隙，讓邊界得以被挪動、被試探，甚至被重新劃定。越界想像也因此不只停留於拒絕或撤離，而開始指向另一種重新安置的可能。半空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它遠離地面，而是因為它具象地呈現出「出路」想像的拉扯與矛盾：一方面，必須與地面秩序保持距離，否則「離軌」終將被拉回「治療」與回復「正常」的邊界內；另一方面，又必須保留某種可供安置的條件，否則便只剩餘徹底的斷裂與消失。半空因此可被理解為一種自創邊界的實踐，它拒絕被收編，卻也不是就此把一切關係一刀兩斷，而是致力在不穩定的狀態之中試探「仍能如何相處」。

若放回更廣闊的香港文學脈絡中觀察，《離心帶》與西西（1937–2022）的名篇〈浮城誌異〉（1986）似乎形成了一種跨時代的遙相呼應。西西筆下的「浮城」帶著一種隨著八十年代時代張力而生的獨有的無力感，城市雖浮在半空，卻缺乏飛翔的能力，映照著走在回歸路上的香港人在「九七政治」底下無法決定自身命運的無奈處境；韓麗珠則在《離心帶》中藉由半空的想像對「浮城」的經典意象作出創造性轉化，使半空不再只是迷惘和困局的象徵，也可能成為尚未完全成形的出路想像。²⁴然而，小說同時沒有把半空的「浮城」勾勒成煥然一新的新家園。當敘事者形容「鳥」抵達半空後感到前所未有的困乏，閉上眼打算好好睡一覺時，這座新建的「浮城」便帶上疲乏與停頓的色調。這樣的收束不是單純的悲觀，而更像一種刻意的停留。半空的「浮城」在此既像一束微光，也像一個暫時的停靠處。它讓人看見不必回到

²⁴ 關於兩部作品之間的潛在連繫，可參見拙文的討論。見黃逸朗，〈跨越「浮城」邊界的跨時代回應：論西西〈浮城誌異〉（1986）和韓麗珠《離心帶》（2013）〉，《文學論衡》第45期（2025年9月），頁90–102。

地面的希望，卻沒有立刻把前路交代清楚，也沒有把新生活的樣貌描繪得穩妥可握。如此這般，半空的「浮城」既保留了珍貴的想像空間，同時也把不確定性一併留了下來。正是在這種停留與未竟之中，《離心帶》把越界想像推到更尖銳的位置：「離軌」確實使人看見另行自創的可能，但可能並不等於可行，它也許只能被保留在半空的懸置空間之中，被拖長、被延宕，直至浮現輪廓。

若放回後九七的語境來看，這種半空中的懸置狀態，所折射的並不只是個體的失重經驗，更是一種屬於香港的文化心理：當舊有位置已難以安頓自身，而新的秩序又尚未真正提供可供棲身的形式時，個人只能在未竟、延宕與不確定之中拖長出路的輪廓。《離心帶》之所以重要，正因它沒有把這種懸置簡化為純然的絕望，而是在失重之中保留了調整位置與關係的微弱可能。由是觀之，《離心帶》所開啟的，已不只是對既有邊界的防守，而是對另一種邊界形態的想像。相較於《縫身》在邊界被拆除後重新確認其必要，《離心帶》更進一步把越界推向一種生成性的方向。小說中的「半空」既不屬於既有地面秩序，也尚未凝固為另一套穩定規範，而更接近巴巴所說的閹限空間：它不是單純的撤離或逃逸，而是一個尚未定型、仍可安排位置與關係的中介場域。換言之，《離心帶》的越界想像不只是離開社會規訓所劃定的軌道，而是試圖在既有秩序之外，開闢一種協商關係尺度的新可能。若說《縫身》在縫合秩序中反向凸顯邊界之必要，《離心帶》則進一步指出，邊界並非只能被守護；在越界之後，它也可以成為抵抗既有秩序、重組個人／社會關係的臨界條件。

四、結論：重塑連結的（不）可能

綜合本文所論，《縫身》和《離心帶》共同呈現出一種位處城市邊緣的文化身分。這種身分並非僅指向社會的邊陲位置，而是指向一種與主流秩序保持距離的姿態，它在被迫「貼合」與被迫「在軌」之間，拒絕把自我完全交還給既定的價值安排，並以越界想像向其發起挑戰。在《縫身》中，面對強行加諸的縫身法例，主人公「我」沒有如大部分人般隨波逐流，被社會規訓輕易收編，而是在有限的縫隙中嘗試抵抗。「我」以撰寫論文為方法，在個人空間逐漸式微的連生世界中保留一絲獨立性，並以思考與書寫捍衛個人／社會之間愈趨模糊的邊界。及至《離心帶》，小說角色所面對的壓力不再是直接通過法例推動的「貼合」，而是透過更軟性的「疾

病」治療，把不協調的感受與「離軌」的欲望納入醫療與管理的範疇。飄蕩者母女「鳥」與「了」在長久掙扎後，決心擺脫病患標籤，以「離軌」作為方法，嘗試突破社會規訓的牢固邊界。兩部作品因此在不同層面上揭示，所謂邊緣，不必然只是被忽視的非主流位置，反而往往隱含著在壓力之下仍不肯完全被同化的抵抗能量。

至於這種抵抗能量能否轉化為重塑個人／社會連結的契機，兩部作品均刻意保留可供延伸思考的空間，拒絕為複雜的問題提供簡單答案。其中，死亡與出路的張力是重要的一環。在《縫身》中，「我」在完成論文後選擇以自殺的方式徹底從連生世界中解脫；《離心帶》雖沒有明確交代「了」等「離軌」者的最終結局，敘事卻屢次把飄蕩的終點與死亡相扣連。在兩個故事中，死亡無疑均被賦予積極的意義，指向一種不向同化屈服的決斷姿態；但死亡同時具有封閉性，它無法直接提供可延展的生活藍圖，也無法在拒絕之後立刻帶來建設性的新秩序。正因如此，死亡的作用更接近一種極限語言：當個體差異被視為需要修正的偏差，當規訓以共同體之名把人推向全面「貼合」或全面「在軌」，所謂連結便不再是互相照應，而更像吞沒與收編。在這樣的理解下，死亡並非浪漫化的答案，而是把「不可再被如此連結」說到最絕對的方式。它不提供路徑，卻清楚畫出阻礙路徑的結構形狀，使「不可能」不再只是抽象的悲觀，而是一種被揭露出來的規訓現實。正是在此，《離心帶》安排「鳥」最終沒有走向死亡，而是選擇在半空自創「浮城」，才格外關鍵。半空既與死亡相近，同樣指向對地面秩序的拒絕，卻又不等同於終結。它暫時擱置了「答案必須落地」的前提，使重塑連結成為一種在不確定中持續調整關係尺度的實踐。

回顧本文的脈絡，重塑香港連結的（不）可能，正是在裂縫、死亡與半空之間被更清楚地照亮。本文並非將《縫身》與《離心帶》視為兩部彼此孤立的作品，而是透過對讀，追蹤韓麗珠如何沿著個人／社會邊界的拆解、重設與越界想像，持續思考後九七香港關係結構的變形與再協商。一方面，兩部作品都拒絕把連結理解為無差別的「貼合」，也拒絕把共同體的想像建立在抹平差異之上。若說《縫身》透過全面「貼合」的極端設定，反向凸顯邊界作為保存個人空間之必要，《離心帶》則進一步將越界推向生成性的方向，使邊界不再只是防守的條件，也可能成為重新安置個人與社會關係的中介場域。就此而言，本文所嘗試補充的，不僅是兩部作品各自的主題意涵，更是它們如何共同構成一條持續展開的問題鏈，照見韓麗珠如何以文學形式回應後九七香港連結的斷裂、轉向與未竟之處，並由此映現城市文化身分在出路未明的處境中如何被反覆協商與重新想像；另一方面，作品也以其極端的實驗與

懸置的叩問提醒我們，在後九七的隱性社會壓力之下，邊緣性的能量固然能撐開縫隙、揭示問題、發出異聲，卻未必能自然轉化為清晰可循的前路。裂縫與「離軌」所提供的，是不被收編的姿態與重新安置的方向感；至於如何把這種方向感推進為可延展的生活形式，如何把邊緣位置之間的互相照應化為更持久的關係實踐，仍是一道尚待完成的課題。死亡把秩序推到極限，半空把拒絕延宕下去。而重塑連結的（不）可能，正是在這種「極限」與「懸置」之間被照亮，成為我們必須持續思考的命題。

參考書目（按作者或編者筆劃和字母排序）：

- 何翹楚，〈一點點縫起的小說——訪《縫身》作者韓麗珠〉，《明報》，「讀書」版，2011年1月16日。
- He, Qiaochu. "A Novel Sewn Together Bit by Bit: An Interview with Hon Lai-chu, Author of *Body-sewing*." "Ming Pao, dushu (reading)" section, 16 January, 2011.
- 孫梓評、韓麗珠，〈詩小說對話錄——孫梓評 vs. 韓麗珠〉，《印刻文學生活誌》第115期（2013年3月），頁24-44。
- Sun, Ziping, and Hon Lai-chu. "A Dialogue between Poem and Fiction: Sun Ziping vs. Hon Lai-chu." *INK Literary Monthly* 115 (March 2013): pp. 24-44.
- 梁淑雯，〈無法「把身體放下」：香港女作家韓麗珠小說中的身體書寫〉，《文藝爭鳴》第2期（2018年2月），頁7-13。
- Leung, Shuk-man. "Unable to 'Put Down the Body': Body Writing in the Fiction of Hong Kong Female Writer Hon Lai-chu." *wenyi zhengming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ntention)* 2 (February 2018): pp. 7-13.
- 符燕鴻，〈無法自控的身體——韓麗珠《縫身》初探〉，《名作欣賞》第14期（2015年5月），頁49-50。
- Fu, Yanhong. "The Uncontrollable Body: A Preliminary Study of Hon Lai-chu's *Body-sewing*." *Masterpieces Review* 14 (May 2015): pp. 49-50.
- 符燕鴻，〈論韓麗珠《縫身》的空間書寫〉，《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3期（2015年6月），頁82-86。
- Fu, Yanhong. "On Spatial Writing in Hon Lai-chu's *Body-sewing*." *Journal of Guang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3 (June 2015): pp. 82-86.
- 溫煒瓚，〈香港作家韓麗珠小說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 Wen, Wei-ling. "Studies on Hong Kong Novelist Li-Zhu Han (Hon Lai-chu)"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oyuan, 2015.

黃冠翔，〈「不完美個體」的隱喻：香港後九七與「非常態」敘事〉，《文化研究季刊》第 177 期（2022 年 4 月），頁 1–22。

Huang, Kuan-hsiang. “The Metaphor of the ‘Incomplete Individual’: Narrative of ‘Abnormality’ in Hong Kong Novels After 1997” *Cultural Studies Quarterly* 177 (April 2022): pp. 1–22.

黃逸朗，〈跨越「浮城」邊界的跨時代回應：論西西〈浮城誌異〉（1986）和韓麗珠《離心帶》（2013）〉，《文學論衡》第 45 期（2025 年 9 月），頁 90–102。

Wong, Yat-long. “A Cross-Generational Response Towards the Transcending Boundaries of the ‘Floating City’: On Xixi’s ‘Marvels of a Floating City’ (1986) and Hon Lai-chu’s *The Body of Centrifugation* (2013).”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45 (September 2025): pp. 90–102.

董啟章，〈「自然懼怕真空」——寫作的虛無和充實〉，韓麗珠：《風箏家族》（台北：聯合文學，2008 年），頁 5–18。

Dung, Kai-cheung. “‘Nature Abhors a Vacuum’: The Emptiness and Fullness of Writing.” In Hon Lai-chu, *The Kite Family*, 5–18. Taipei: Unitas Publishing, 2008.

鄒文律，〈「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中的城市與自然〉，《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28 期（2020 年 9 月），頁 519–551。

Chau, Man-lut. “‘Nature Relatedness’ in Fiction of ‘Post-1997 Hong Kong Young Writers’”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28 (September 2020): pp. 519–551.

鄒文律，〈論韓麗珠《離心帶》的疾病書寫〉，《文學論衡》第 26 期（2015 年 6 月），頁 72–81。

Chau, Man-lut. “On Illness Writing in Hon Lai-chu’s *The Body of Centrifug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26 (June 2015): pp. 72–81.

劉淑貞，〈「消失」作為一種方法：九七回歸後的「我城」書寫——以韓麗珠的寫作為討論對象〉，《東海中文學報》第 43 期（2022 年 6 月），頁 75–113。

Liu, Shu-Jhen. "Using 'Disappearance' as a Method": I-City Writing after Handover of Hong Kong via a Study of Hon Lai Chu's Works" *Tunghai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43 (June 2022): pp. 75–113.

鄧小樺，〈過渡時期的辯證——韓麗珠談《離心帶》〉，《自由時報》，「藝文」版，2013 年 8 月 5 日。

Tang, Siu-wa. "Dialectics in a Transitional Period: Hon Lai-chu Discusses *The Body of Centrifugation*." *Liberty Times*, "yiwen (Arts and Literature)" section, August 5, 2013.

鍾夢婷，〈抵達·軌跡以外〉，《明報》，「讀書」版，2013 年 7 月 21 日。

Chung, Mung-ting. "Arrival: Beyond the Trajectory." *Ming Pao*, "Reading" section, July 21, 2013.

韓麗珠，〈生命中不能缺失的寫作〉，《讀書好》第 42 期（2011 年 3 月），頁 9–11。

Hon, Lai-chu. "The Writing that Cannot be Missing from Life." *Books4You* 42 (March 2011): pp. 9–11.

韓麗珠，《縫身》（台北：聯合文學，2010 年）。

Hon, Lai-chu. *Body-sewing*. Taipei: Unitas Publishing, 2010.

韓麗珠，《離心帶》（新北：INK 印刻文學，2013 年）。

Hon, Lai-chu. *The Body of Centrifugation*. New Taipei: INK Literary Monthly Publishing, 2013.

Chow, Rey.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62–163.

The (Im)possibility of Rebuilding Linkages: Boundary-crossing Imagination of Hon Lai-chu's *Body-sewing* and *The Border of Centrifugation*

Jason Yat Long WONG *

Abstract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concept of boundary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personal and the social through a comparative reading of Hon Lai-chu's *Body-sewing* (2010) and *The Border of Centrifugation* (2013), examining the deformation and renegoti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rsonal and the social in post-1997 Hong Kong. It argues that *Body-sewing* follows a narrative trajectory of de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subversive practice of thoroughly dismantling boundaries, the novel paradoxically renders their significance newly visible, underscoring the need to prevent personal space from being absorbed into social discipline. *The Border of Centrifugation*, while continuing this concern with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space, moves a step further by sketching a path of “derailment” that seeks to break through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imposed by society. By shaping “mid-air” as a suspended space, the novel reimagines how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rsonal and the social might be repositioned. Read together, the two novels show that Hon neither understands linkage as undifferentiated fusion nor reduces boundary-crossing imagination to a simple escape from reality. Rather, linkage and boundary-crossing point to an attempt to recalibrate relational scales under constrained conditions. By tracing how boundaries are dismantled, redirected, and re-established across the two works, this article further argues that Hon persistently reflects, through literary form, on the fractures, reconfigurations, and unresolved dimensions of relational structures in post-1997 Hong Kong, thereby responding to the (im)possibility of rebuilding Hong Kong's linkages.

Keywords: Hon Lai-chu; boundary; boundary-crossing imagination; post-1997 Hong Kong literature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